

新书掠影



该书从中国最古的四代虞夏商周起,寻踪氏族与地理的源流,重点讨论周民族兴起与国家社会形成的各个方面。作者以文献与考古相结合,并借鉴民族学的研究,以多重证据论证了“郁郁乎文哉”的周。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杨向奎 著
北京出版社
2022年4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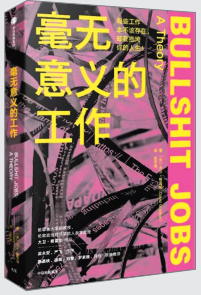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堆芯熔毁的并不仅仅是核电站反应堆的堆芯。本书记录下事故中相关人士的无能与推诿责任,他们全都陷入了“堆芯熔毁”的状况。

《堆芯熔毁：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实录》
[日]大鹿靖明 著
熊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5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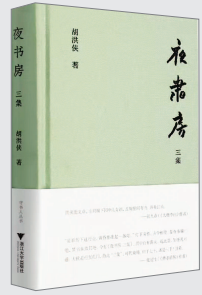
本书将大众熟悉的31个趣味话题分成八大版块,解读其内在的语言学原理;又从每一个话题延展开来,阐明同一话题在不同方言的流变,铺陈出一幅幅民族历史文化的画卷。

《南腔北调：方言里的中国》
郑子宁 著
海峽书局
2022年4月出版



是谁在创造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它是如何降低效率,阻碍个人价值的实现,加剧不公平的?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将自己的观察、研究与反思悉数呈现,剖析当代社会病灶。

《毫无意义的工作》
[美] 大卫·格雷伯 著
吕宇诺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7月出版



“夜书房”是胡洪侠的书房,也是他系列书话集的书名。造访过“夜书房”的人,都会被胡洪侠那栋高达10米的家庭书房所震撼,那是他精心构建的精神世界,也是他读书与写作的理想场所。

《夜书房》(三集)
胡洪侠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书人茶话

从“热带雨林”到“社交货币”

——漫谈18世纪欧洲的书籍与阅读

■ 后 商

麦克兰汉曾预言印刷文化会走向终结,从媒介学的意义上看,麦克兰汉的预言看似实现了,但他也低估了书籍的可靠性,今天人们更热衷于讨论纸质书和电子书的优劣,而不是书籍的消亡。

这个过程中,有一波人开始了对书籍与知识的考古,这便是新史学、新文化史、书籍史、阅读史……各种称法名目不一,表面看来它们旨在揭示所谓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内容,即复杂历史的千奇百怪的面貌,但真实诉求却与一种洞察力和想象力有关。从祈祷书到休闲书,从印刷书到电子书,书籍的命运也是知识的命运,甚至关乎人类的命运。回顾18世纪欧洲的书籍史和阅读史,并与当下发生的技术更新和书籍改良作一个观照,它们未必是既成系统的一部分,但确是我们重启历史,重启我们内心叙事的起点。

书籍史与法国大革命

1455年,古登堡用他发明的铅板活字印刷机印刷了一本圣经。伴随印刷术普及而来的,是某种现代精神,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知识和世界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关于18世纪法国书籍史的研究无疑揭示了这种潜在叙事,即书籍如何在历史叙事中传播思想,消化变动中的情感与故事。

书籍史关注书籍的制作和传布,也就是一本书如何从印刷厂、出版商抵达读者。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美]罗伯特·达恩顿著,高毅、高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达恩顿就以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为参考,将出版商、印刷商、油墨制造商、偷运者、货栈主、图书代理商、作家、审稿人、读者等从幕后拉到前台,展现了出版系统的运作。1778年7月,纳沙泰尔的销售代表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骑马出差,历时五个月穿越法国,访问了沿途经过的几乎所有书店。法瓦尔在日志和信件中保留了他几乎全部的工作记录,包括货运、市场需

求、账目、书籍,以及书商的评价,其中所呈现和折射的旧制度时期的图书市场,达恩顿以为可以和巴尔扎克的《幻灭》相互映衬。它以财富为核心,涉及盗版、偷运、刺探情报、秘密经营等情节,却在正统之外种植了时代的文化精神——启蒙主义者如皮埃尔·贝尔、让-雅克·卢梭的书籍正裹挟在这些地下的图书市场。

19世纪以前欧洲的图书市场,部分书籍甚至大部分书籍都没有取得官方许可。正如达恩顿在他的另一本谈18世纪法国书籍史的书《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所说,“在巴尔扎克之前,要让书籍到达思想市场,就得上演整个一部人间闹剧。”在该书中,达恩顿将视野更为聚焦,带我们领略禁书如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禁书的制作和流传又如何反映着社会思潮的更替。这些违禁书籍统称“哲学书籍”。禁书的出现要归功于巴黎书商行会、路易十四,以及新闻审查。比如历来政府为了支持巴黎的出版商,会对所有进口图书征收高额关税;比如大量禁止发行的作品开始在地下发行。巴黎书商行会官员会没收他们认为不合规的书籍,列以“禁书”“非经允许的书”“盗版书”等不同门类,但这些门类通常重叠、相互矛盾、杂乱混淆。出版于1748年的《开放的特丽萨》是其中的典型。大约1773年,《开放的特丽萨》成了畅销书,沙龙常客推动了它的流行,混杂在“彩虹女神的屁股”“费城出版”“以自由的名义出版”“出版于距巴士底狱一百码处”之中。这部作品甚至得到了萨德侯爵的称赞,称其为“把对神的不敬和奢侈放纵可以让让人接受地联系起来的书”。

百科全书主义与启蒙运动

在当下的语境中,书籍史的分支——阅读史似乎更受关注。相比于印刷、藏书、图书馆、书目,人们更青睐书籍的使用和书籍的大众化、阅读以及流行文化。阅读史专注的是阅读的行为、阅读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
[美]罗伯特·达恩顿 著
郑国强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启蒙运动的生意》
[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
叶桐 顾杭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的环境以及基于阅读的成长史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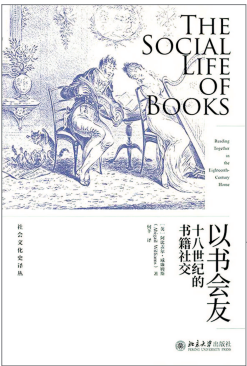
据统计,1773年,一半以上法国人(14岁以上)过去一年没有读书,大约三分之二是文盲。英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而到1800年,英国女性识字率达到40%,男性达到60%。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识字率的攀升,社会上还有一种论调,即担心人们受小说的干扰和引诱。论者在《格拉布街周报》1734年9月一期叹惋道,“有那么多的底层人士,相较于温饱,想更多的是陶冶心灵……过去我总认为,有95%的人生来就是捣鼓买卖和手艺的;让他们去读书是害了他们,他们不会变得更好或更明智,反而会变得莽撞、烦人和好斗。”大约半个世纪后,这样的看法逐渐退却了,另一个看法成为了主流,即开卷有益,且不应区分阶层。

《百科全书》的印刷和传播,几乎可以说是18世纪最大的生意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百科全书》以及百科全书主义成为启蒙运动的最好标识,启蒙运动追随着《百科全书》的流传抵达外省,并

散布在欧洲各地。参与的书商们也明显知道了这一点。“在这一进程中,启蒙观念经由商业动脉逐渐渗入了欧洲大陆最遥远的地区。他们知道自己是启蒙运动的媒介,不过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负有传播启蒙运动的义务,而是因为他们做启蒙运动的生意。”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写道。与此同时欧洲正在发生一次阅读改良,人们开始从精读过渡到泛读,公共舞台逐渐从舞台表演、法庭转移到书籍和报刊上面。直到17世纪下半叶,人们仍然反复阅读《天路历程》,但那之后,人们更倾向于广为涉猎,通俗读物变得越来越重要。

阅读史与英国社交

18世纪前半叶,英国报纸杂志的重要逐渐凸显,其读者包括贵族、学徒等不同群体。《每月评论》《文艺期刊》单期发行量多达3000册,而除少数重要著作之外的书籍印量都只有几百册。在1746



《以书会友：十八世纪的书籍社交》
[英]阿比盖尔·威廉姆斯 著
何芊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年到1780年间,这些报纸大多6便士一册,年费6先令6便士,年费大约是两本小小说的价钱,大约是进出口商人年收入的1/800,农场主的1/200,长工的1/50。算下来,似乎只有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才可以较好地分享印刷品的成果,所以人们不仅阅读报纸,还分享报纸。据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在《以书会友：十八世纪的书籍社交》中转引的牧师约翰·彭罗斯的日记:“马什夫人与格雷厄姆夫人的社交状态我无法置评。我借给她们《伦敦记事报》,她们借给我《每日公报》,这是我们之间主要和几乎唯一的交流。”不夸张地说,书籍变成了社交货币。

除此之外,人们还会誊抄片段、诗歌、评论等等。这些抄写存放于私人笔记本中,被后人称为自我书写,这是一个集诗歌、纪念、图画、灵感为一体的空间。这样的笔记本对应着那些节选类的出版物,比如爱德华·比希的《英国诗艺》。编者在献词里声称,本书混杂了很多主题和想法,“可能比不上一部体裁完美、主题单一的作品那么令您满意,但也许它能让您更轻松愉快,因为这里没有故事线索,也没有前后呼应,您既无须保持全神贯注,也不用耗费过多时间,这本书您可以随意拿起和放下,与其把它摆在书柜,不如放在起居室或庭院。”比希的话值得做一些延伸,他提倡读者在多种场合阅读诗歌,以使其获得最广泛的效力。这正好对应着一种时代精神,即公共阅读和私密阅读可以相结合,其场合就变成了客厅。新的公共性意味着以家庭和交往为核心,创造出一种广泛的关联。关于共读的美好想象出现了——很多书籍扉页都有家庭团聚、围炉夜谈的画框,读书俱乐部、小型订阅图书馆也随之兴起。理查德·波尔威尔参加玫瑰园读书俱乐部时记录了当时的盛况,“室外,车驾云集,小镇熠熠生辉”,而“室内,则是理性的盛宴,流淌着热情”。

我们和新的历史现场

1958年《印刷术的诞生》出版,书籍

故纸爬梳

“故书”中的温州文化风貌

■ 陈子善

“东嘉”是浙江温州的别称。宋陈叔方《颍川语小》卷上谓“温为永嘉郡,但俗因永嘉有嘉,或永嘉为东嘉”。方韶毅这本《东嘉故书谭》(文汇出版社即出)无疑是漫谈与温州相关的各种“故书”。当然,“故书”往事也不是“故”到漫无边际,而是有十分明确的选择,那就是把范围限定在晚清民国时期。这一时期印行的书刊,只要作者是温州人氏,只要能找到,就都在作者搜集考订之列。日积月累,许多以前不为人注意甚至早已被遗忘的“故书”被方韶毅发掘出来了,不仅发掘出来,还作了饶有意味的诠释。

《东嘉故书谭》中展示了那些与温州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故书”,其中有历史学的,有教育学的,有心理学的,有新新闻学的,有商学的,有经济学的,有军事学的,有语言学的,有数学的,还有研究国际问题的,甚至连谈育儿法的,谈医术的,谈柑桔改良栽培法的都有。虽然还不能说应有尽有,但涉及面之广,着实令人惊讶。由此足可见温州这个地方人才地灵,人才辈出,也足可见方韶毅搜集之广之勤。更难得的是,他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书”不但作了提纲挈领的评价,还对其作者也逐一查考,对这些有名或无名的作者的经历和贡献颇多新的发现。总之,温州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文化风貌就通过这些“故书”和方韶毅的妙笔生动而又别致地呈现出来了。

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自然对这本书中有关文学的部分特别有兴趣,全书确实也是一半以上篇幅探讨文学和文艺书籍。出生于温州的现代作家真不少,方韶毅对鲁迅作序的叶永蓀著《小小十年》版本的细致梳理以及对稀见的叶永蓀《我的故乡》一书的分析,

对赵瑞蕻所译中国第一部《红与黑》译本版本的考订及对赵瑞蕻老师夏翼天生平的真证,对朱维之代表作《中国文艺思想史略》的版本尤其是盗印本的爬梳和对其所著《无产者耶稣传》的评述,还有他对名不见经传的陈适及其所著《作文三步》(《文坛杂记》)的发掘及随之带出的林语堂集外文《〈人间杂记〉序》等等,都要言不烦,引人入胜,也都不同程度上填补了温州地方文学史、浙江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空白。

除此之外,《疯人》一文也深得我心。此文讨论刘廷芳译《疯人》。散文诗集《疯人》是中国最早的纪伯伦翻译单行本,《疯人》一文不仅认同刘廷芳的译文“清丽可诵”,还进一步介绍了可称“罕见书”的刘廷芳刘廷蔚兄弟的“风满楼丛书”六种。这是我见到的最早评价“风满楼丛书”的文字。虽然较为简略。方韶毅为我主持的《海豚书馆·红色系列》编选了刘廷芳著《过来人言》(2013年3月海豚出版社初版),后来竟能在加拿大找到不为人知的刘廷蔚与徐志摩1924年在庐山的合影,撰写了论文《中国新诗史缺失的一页:从新发现的徐志摩与刘廷芳庐山合影说起》,在拙编《现代中文期刊》2021年第六期发表。他也因此成了国内屈指可数的新诗人刘廷芳刘廷蔚兄弟研究专家,而这一切应该就是从本书中的《疯人》一文起步的。

近年来,“地方性知识”理论的引进,“地方路径”探索的开始兴起,“地方文学”研究的不断展开,这些都是令人可喜的学术研究的新气象。而方韶毅有感于搜集晚清民国时期温州人著作之不易,有感于这些年来温州“地方的消失”,以极大的热情,以一己之微力,持续地尽可能地搜集整理温州地方文献,真是功莫大焉。

典范式移民史的精彩续章

■ 路伟东



《中国移民史第七卷：清末至20世纪末》
安介生 张根福 陈鹏飞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期,葛剑雄先生主编,安介生、张根福、陈鹏飞三位先生合作撰写的《中国移民史》第七卷《清末至20世纪末》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煌煌近70万字,绪论之外分为两编十章,另附表格百余幅,全局性地展现了中国20世纪主要移民运动的宏大图景,并从时代背景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对其当中部分重要移民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地分析和解读。总体来看,该卷章节编排合理,史料搜罗宏富,学术目标明确,叙事合乎规范,是近年来中国移民史领域出现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之一,也是研究20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参考。

199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三位先生合作撰写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该书作为中国人人口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一经问世就得到了学界同仁的高度赞誉,被称为“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系统的中国移民史专著……一部填补空白的高篇巨著……一部可以传世的佳作”。基于此,时隔20余年,当该套典范式移民史著作再版时,增补原来相对薄弱且缺漏较多的20世纪移民史就成为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因为,新增卷除了必须相

关学术水准上与之之前六卷进行对标外,还需要穿透海量原始文献和既有丰富成果的桎梏,全面洞察远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复杂的20世纪移民问题。从最终出版的著作看,三位作者无疑给出了精彩答卷。

近20年来,随着国内学术与世界全面接轨,具有明确学术关切的专案式研究成为学界主流,通史性的学术著作逐渐远离学术的中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通史性的著作不重要。实际上恰恰相反,全面性的通史著作往往是一个学科的重要奠基石。因为,相比于精深的专案研究,这样的著作能够提供更加综合的知识体系和宏观的解释模式,在明确学科边界的同时,更能全面系统地总结既有研究基础、突出工作重点和可能的努力方向。本书作者们在全面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研究时段内相当一部分“基本问题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只是全面性的通史著作却没有出现”。因此,应该把全面性的通史著作作为工作的目标,这无疑找到了写作突破的关键点。

在具体篇目编排上,作者从清朝至民国初期移民问题的认知和移民政策的制定写起,阐述了清朝前期人口管理制度和移民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清代后期移民问题的认知与边疆移民政策的转变。其后的篇章按照时间逻辑,重点关注了清末至民国前期东北地区的移民运动、20世纪上半叶的灾荒性移民高潮、抗战时期的东部人口西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大陆向台湾移民和干部南下移民、20世纪后半期的西部边疆建设及跨区域开发移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移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水库移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移民运动等。这些重大移民主题,全面扼要、纲

举目张,框架式地勾勒出了20世纪中国移民运动的概貌,为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系统了解或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移民问题提供了严肃的学术讨论基础和时空参照。

20世纪是中国从传统帝国往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结构化变革时期,移民活动的背景、动机、过程、规模以及方向等均与之前典范式移民史所关注的传统时期的移民运动有很大不同。把这些类型迥异的庞杂主题纳入统一的体例之内进行写作并不容易,为此,作者着力考量了清朝前中期与20世纪初期、1949年前与1949年后两个时间截面上的移民过程的衔接问题,对灾荒性移民、战争性移民、开发性移民以及政治性移民等不同类型的移民活动进行了综合考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出现的移民类型,如“大小三线建设”移民、西部工业化移民、城市化移民等,也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已有研究及地方文献所记录的内容平地地展现出来,做出了较为客观的界定和论述。

因为关注内容繁多且大部分主题都已经有了成熟丰富的研究成果,通史性著作往往流于对既有成果的综述、海量史料的堆砌和基本史实的罗列,从而缺乏深入的全局性理论分析。本卷作者清晰地认识到这一传统问题所在,在全面回顾中外学界有关移民法则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思考,提出了一些在中国移民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法则”,如:政治迁移法则、人口密度及人口承载力迁移法则、灾荒迁移法则、民族迁移法则等,尽管这些移民法则是否与中国移民实践真正适配仍有值得商讨之处,但这样的理论探索和努力实践无疑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本卷作者对中国移民运动的成